

# 《砾心》中主人公萨利姆的创伤解读

谭 昕

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吉林 吉林 132600

**【摘要】**诺奖得主古尔纳的作品《砾心》以桑给巴尔政变为背景,勾勒了流散个体悲剧性的命运轨迹。主人公萨利姆因家庭变故跟随舅舅前往伦敦留学。故乡的创伤记忆时常侵扰他在异乡生活,最终在多年后通过与父亲的深入交谈,埋藏的真相才浮于水面。该文根据赫尔曼的创伤理论,从过度警觉、记忆侵扰和紧闭畏缩三个方面分析主人公的创伤表征,探究造成其创伤的家庭成因和社会成因。尽管萨利姆积极治愈创伤,但其恢复阶段的停滞不前说明了创伤带给人的伤害是不可逆的。他虽成功地建立了安全感,但因殖民历史遗留的文化与种族问题,在回顾哀悼和重建联系中疗愈创伤失败。通过解读主人公萨利姆的创伤,该论文旨在关注非洲流散人群的创伤经历,聚焦人类存在的创伤心理问题和精神困境,探索疗愈创伤的路径。

**【关键词】**《砾心》; 创伤理论; 创伤表征; 创伤复原

## 1 引言

《砾心》是英国籍坦桑尼亚裔诺奖获得者古尔纳的后期作品。小说通过主人公萨利姆的流散之旅揭示其遭遇的心理创伤。国内外学者对于该小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人物的精神突围、记忆书写和家园意识等,鲜有学者从创伤视角来解读。本文根据朱迪斯·赫尔曼的创伤理论,探讨主人公萨利姆的创伤表征,分析导致其创伤的原因,揭示主人公未能彻底疗愈的创伤给现代流散族群带来的启示。

## 2 创伤表征:被抛弃的“他者”

朱迪斯·赫尔曼认为,心理创伤是“一种自己感觉毫无力量的苦痛。在创伤中,受害人受到强大力量的冲击,处于无助状态。”<sup>[2]</sup>她在《创伤与复原》中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许多症状归纳为过度警觉、记忆侵扰和紧闭畏缩三类。

### 2.1 过度警觉:从恐惧到叛逆的心理防御机制

这三类症状在《砾心》主人公身上均有体现。父亲在萨利姆7岁时离开家庭,母亲赛伊达对其的解释一直闪烁其词。这让萨利姆恐惧,在生理上表现为心跳加速,“仿佛身处异地陌生的人群中,一下子丢开了牵着父亲的手”。<sup>[4]</sup>这种家庭变故造成的双重创伤,埋下被抛弃的阴影,诱发了持续性的应激反应。根据赫尔曼的观点,“受创者很容易对很小的刺激做出易怒的反应,一点小小的刺激就暴躁不安。”<sup>[3]</sup>其次还体现在迁怒他人。母亲有了新归宿后,“无家可归”的萨利姆便处处对母亲叛逆,“母亲叫儿时,我也不总是搭理她。她训斥我时,我扭头就走”<sup>[4]</sup>这是他试

图消解恐惧焦虑的防御机制,任何细微的情感波动都会触发其敏感反应。而亲情关系的失衡导致的隐性暴力,最终内化为个体生命早期的创伤性记忆,在心理层面构建起持续性的应激防御系统。

### 2.2 记忆侵扰:创伤记忆的结构化呈现

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中提出“在创伤性精神症患者的梦中,患者反复被带回到曾遭受的灾难情景下,随之而来的惊恐再次冲击他,致使他从梦中惊醒。”<sup>[5]</sup>经历过严重心理创伤的人,常常会在事后反复被痛苦的回忆纠缠。父亲的离开给幼小的萨利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导致其离开时留下的沉默者的形象一直刻在主人公的脑海里。主人公14岁时,父亲带给他的自卑感不断加深。“我认为父亲颓唐的原因是羞愧,他将这种羞愧感不仅施加在自己身上,还连带着延伸到我身上。”<sup>[4]</sup>这种羞耻感影响到主人公自我身份的建构。伦敦留学初期,在异乡的孤独感与不适应得不到排解,潜意识中又被童年的创伤记忆不断侵扰,脑海中还时不时浮现出父亲孤独颓废的形象,“有时午夜醒来,我的耳边还响着梦中发出叫喊的回声。”<sup>[4]</sup>多年后回国时想起父亲仍会被带到屈辱感的场景下,这揭糞了父亲离去时的羞耻感给幼小的萨利姆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以至于一直在童年与成年的记忆中反复重现,在梦境中更是萦绕不散的梦魇。

### 2.3 紧闭畏缩:创伤记忆的情感防御

受创者的“感知能力可能已经麻木或受到扭曲,伴随着

某些感官器官的部分麻痹或丧失。”<sup>[3]</sup>首先体现在日常社交的情感钝化。在伦敦“非统房”的居住时，他拒绝两性交往，面对邻居介绍女友选择沉默回避，“一想到和一个女人亲热，我就感到恶心和焦虑，不得不压制那些回忆”<sup>[4]</sup>。这是童年创伤的潜意识投射。萨利姆将亲密关系与家庭屈辱关联，形成情感拒斥。他的自我封闭不仅是个体选择，更是创伤记忆对人际信任体系的系统性破坏。其次，他无法与女友朗达构建两性关系。女友朗达总喜欢在凌晨给萨利姆打电话，“现在每当她半夜给我打电话，我都不得不压抑内心痉挛似的负疚感，后悔自己没有经常给母亲打电话。”<sup>[4]</sup>电话铃响成为触发家庭创伤记忆的心理扳机：表面上借“时差”逃避与母亲联络，实则是对重构母子关系的本能抗拒。这种防御性回避延续了自童年创伤应对机制——通过压抑家庭痛苦经验。“受创者会避免任何足以勾起过往创伤回忆的情境，或任何可能涉及未来规划与风险的行动。”<sup>[3]</sup>这种对创伤叙事的主动规避，本质上是对潜在情感威胁的预感性防御。

### 3 创伤根源：造成个体创伤的双重维度

萨利姆的创伤表征仅是问题的外在呈现，挖掘其深层创伤根源至关重要。笔者通过细读文本发现：家庭创伤背后有着深层的社会根源：殖民历史留下的种族和文化流散困境。

#### 3.1 异化的原生家庭

家庭是萨利姆创伤的最初场域，异化的情感关系是其心理创伤的核心根源。弗洛伊德指出：童年的创伤更加严重些，因为他们产生在心智发育不完整的时期，更容易导致创伤。<sup>[6]</sup>家庭创伤首先体现在童年断裂的感情依附，这种情感封锁使年幼的萨利姆陷入“被抛弃”的认知困境，既无法理解家庭变故，也难以建立对亲密关系的信任。母亲重组家庭时剥夺其知情权，强化了他“被排除在核心家庭之外”的他者体验，导致母子关系产生异化。萨利姆与父亲的沟通更是极少，缺乏父爱，他从小就觉得父亲不想要自己，对父亲的了解仅来自他人的只言片语，在他心中，5岁时与父亲欢快的记忆“是藏在心里小小的财富……我有时会怀疑，那些和爱抚有关的记忆，是我为了安慰自己的事情。”<sup>[4]</sup>雅克·拉康认为：“主体是认同在他人身上并一开

始就是在他人身上证明自己。”<sup>[7]</sup>在沉默的家庭下成长起来的萨利姆，对自我身份认知模糊，遇到困难时性格懦弱、沉默。商科成绩不佳时首先想到的是退缩，这既是羞愧更是逃避。在写给母亲的信件中，他选择性隐瞒孤独、迷惘等真实感受，延续了家庭中“沉默即安全”的创伤性应对模式。这种自我封闭并非单纯的情感克制，而是对童年期“沟通必遭拒绝”的条件反射式回应。

#### 3.2 殖民主义下的流散身份

凯西·卡鲁斯这样解释创伤：受创人总是背着一段不可能的历史，或者变成他们自己不能完全拥有的历史的表象。<sup>[1]</sup>作者通过主人公的流散经历，深层揭示了殖民暴行对个人身份认同的摧毁性影响。“古尔纳笔下的创伤人物在非洲生活时承受着殖民主义和社会变革带来的群体性创伤，同时在英国进行流散生活后又遭受着后殖民带来的话语权压制创伤。”<sup>[9]</sup>首先在家乡，萨利姆的悲剧始于殖民霸权的暴力渗透。据父亲后来阐述，哈基姆这一殖民者对权利的泛用导致家庭的悲剧，母亲赛义达为了救弟弟阿米尔，不得不献身高官哈基姆，丈夫马苏德因此受辱离开家庭。哈基姆获得的不仅仅只是赛义达的身体权力，更是对平民百姓自身权力的鄙视与羞辱。哈基姆对母亲赛义达的强夺，表面是个体权力滥用，实则是殖民主义制度性压迫的微观投射。其次，抵达英国后，萨利姆的创伤呈现新形态。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排斥与身份规训，使其陷入更深层的存在困境：伦敦成为物理流散地与精神殖民地的叠加场域。一方面是日常生活中的隐形暴力。萨利姆在舅舅家过寄人篱下的生活逐渐丧失主体性，另一方面是异化的文化认同，为融入英国社会，被迫放弃母语斯瓦希里语，模仿英式生活方式。这种行为本质是对殖民文化霸权的妥协，但这种“去本土化”努力收效甚微，英语的熟练并未带来身份接纳，反而强化了“永远的外来者”定位。萨利姆彻底沦为被家庭、异乡抛弃的“他者”。

#### 4 创伤的复原：殖民创伤下个体复原的曲折进程

赫尔曼认为，创伤复原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安全的建立、回顾与哀悼，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笔者认为萨利姆仅完成第一阶段，封闭的情感通道阻断了通过正常社交重建社会联结的可能，使其无法进入后续阶段。古尔

纳以此揭示了殖民暴行所带来的创伤是难以彻底复原的不彻底。

#### 4.1 安全重建：“非统”房的温暖契机

赫尔曼强调，“复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创伤患者的安全，这是最优先的任务，在达到合理程度的安全前，任何治疗工作都不应轻易尝试。”<sup>[3]</sup>姆盖尼扮演着治疗师的角色，“姆盖尼先生和我聊天时用的是斯瓦希里语。我想这大概也是他从聊天中获得的乐趣之一。<sup>[4]</sup>”此后的日子里，他们彼此陪伴、相互关心，关系亲如家人。“一旦受创伤的人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他便能逐渐打开心门，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sup>[3]</sup>“非统房”成为萨利姆建立安全感的环境，有了家的归属感，他逐渐卸下对外界的防备，主动与外界接触并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他对女孩子也萌生了兴趣，“在这段时间，我爱上了姆盖尼先生的女儿弗里德里卡。<sup>[4]</sup>”赫尔曼指出创伤患者与治疗师之间的关系对创伤疗愈起着关键作用。而姆盖尼先生这一治疗师的身份不仅提供给萨利姆安全舒适的环境居住，而且让萨利姆真正感到被关心、被爱护。

#### 4.2 回顾与哀悼的失败：逃避创伤叙事

在复原的第二阶段，“创伤患者开始诉说她的创伤故事，叙述的方式是完整且详尽的。”<sup>[3]</sup>只有通过哀悼失去的一切，受害者才能发现自己坚不可摧的内心生活。首先体现在萨利姆与女友比莉交往时，被追问家庭背景仅含糊回应：“我不知道，我母亲不喜欢说她的事”。<sup>[4]</sup>其次，对姆盖尼也没有诉说家庭变故的全貌。“我没有告诉姆盖尼先生，其实本质上是我母亲送我来这里的。”<sup>[4]</sup>此外，父亲临终长谈本是创伤叙事的突破口，但萨利姆的倾听始终停留在“信息接收”层面，而缺乏“情感共鸣”。因未被及时诉说导致哀悼过程因缺乏意义支撑而失败。

#### 4.3 重建联系的失败：在流散中重复创伤性循环

创伤复原的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处理了创伤的过去后，创伤患者现在面对的任务是开创未来：他哀悼过去被创伤毁坏的旧我，现在必须重建一个全新的自我。”<sup>[3]</sup>但萨利姆无法建立真正的心理联系。他与朗达的交往仅为缓解孤独，“我都在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关系中，谁对谁更依赖一

些。”<sup>[4]</sup>结尾他选择返回伦敦，“我觉得自己还是要回到那边，回到那未完成的生活，直到它最后给我一个结果，或许也没有结果”<sup>[4]</sup>。有学者认为，回归故土又选择继续出走，像是一种希望的破灭，但在虚妄中又存有一丝光明。<sup>[8]</sup>笔者认为这个选择体现了其身份困境，既无法接受非洲家乡的创伤印记，也无法真正融入英国社会，注定成为“晃来晃去的人”。

## 5 结论

通过剖析《砾心》中主人公萨利姆的过度警觉、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的创伤表征，分析造成其创伤的家庭及殖民主义的根源，探讨其疗愈过程中的困境。萨利姆的防御性沉默导致了创伤叙事的断裂，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又使其在“重建联系”中陷入空心人的窘境。古尔纳通过萨利姆疗愈的失败昭示，流散者在殖民主义背景下遗留的心理创伤是难以治愈的。

## 参考文献：

- [1]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 李桂荣. 创伤叙事: 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19.
- [3] 朱迪斯·赫尔曼. 从创伤到复原 [M]. 施宏达, 陈文琪, 译. 台北: 远流, 2004.
- [4] 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 砾心 [M]. 赵挺,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
- [5]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 [M]. 周珺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9: 8.
- [6]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论 [M]. 贺爱军, 于应机编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256.
- [7] 雅克·拉康. 拉康选集 [M]. 褚孝全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8] 朱振武, 程雅乐. 从诺奖作家古尔纳的《砾石之心》看非洲流散群体的精神突围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 (5): 128-137.
- [9] 刘勇君. 古尔纳流散小说中的创伤书写研究 [D].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4.